

主编 纪宗安 马建春

暨南史學

道堂題前



第十辑



暨南史學

JINAN SHI XUE

第十輯

主編 紀宗安 馬建春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暨南史学. 第10辑 / 纪宗安, 马建春主编. —桂林: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5495-7195-6

I. ①暨… II. ①纪…②马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
文集 IV. ①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096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 421008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张: 16.5 字数: 300 千字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1 200 册 定价: 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顾问委员会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明达 (广东)	马小鹤 (美国)	王子今 (北京)
田卫疆 (新疆)	刘迎胜 (江苏)	李锦绣 (北京)
吴玉贵 (北京)	张国刚 (北京)	张 磊 (广东)
陈高华 (北京)	陈得芝 (江苏)	范立舟 (浙江)
季塔连科 (俄罗斯)	周伟洲 (陕西)	庞晓梅 (俄罗斯)
波波娃 (俄罗斯)	姜伯勤 (广东)	章开沅 (湖北)
彭 卫 (北京)	谢和耐 (法国)	蔡鸿生 (广东)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纪宗安 马建春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
李云飞 吴宏岐 张应龙 张其凡 张晓辉
陈伟明 郭声波 冀满红

编辑室

主 任 刘永连

执行编辑 秦静雅

目 录

从杨孚《南裔异物志》一窥汉代海外交往 陈泽泓/1

若干烹调用香料作物的起源、发展与传播 张 箭/11

墓志铭映印下的唐朝河北粟特人“地著化”问题

——以米文辩墓志为核心 李鸿宾/23

淮西镇在唐代藩镇中的角色与地位 杨文春/43

唐肃宗年间“大食波斯同寇广州”考 刘 宝 张小贵/60

辽上京真寂寺新发现石刻人物图像研究 辛 蔚/71

解构探底：宋代吉州基层区划的变动与调整 王 旭 郭声波/103

两宋东南漕运格局与淮南地区水利开发 张 勇/115

明代镇守广东总兵设置考

——兼论明代广东陆防与海防重心的时空演变 韩虎泰 吴宏岐/127

塞上风华：清代前期乌鲁木齐庙宇的神圣与世俗 王鹏辉/138

清代省澳间的客邮信使 冷 东 沈晓鸣/165

论近代英国对西藏的情报搜集 梁忠翠/177

从战后青岛反美看中美两国民族主义的碰撞

——以驻青美军与民众冲突为中心的考察 张维镇/190

先秦诸子思辨视野下的孔子形象

——以论孟子对孔子的论述为中心 杨兆贵 沈锦发/199

再论章太炎评孔子 朱 浩/217

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》学术价值初探 刘永连/238

附：敬启作者 /248

《暨南史学》稿件格式要求 /249

从杨孚《南裔异物志》一窥汉代海外交往

陈泽泓

[提要]东汉番禺人杨孚的《南裔异物志》，是已知全国最早的异物志。从其辑佚条目中，可寻得汉代岭南与海外交往乃至对海外异国记载的蛛丝马迹，具有极高历史价值。《南裔异物志》所载物产，涉及周边地区、海外国家；所述许多海产，有些产自深海，更有当时的主要贡品；所载还涉及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俗象；有条目专述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国家和瓮人。《南裔异物志》是岭南最早有海上丝路相关记述的志书，是全国最早记载海外风物的志书，也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述扶南等海外国家的古籍。

[关键词]汉；异物志；海外交往

迄今为止，学术界公认《汉书·地理志》是最早记载西汉时中国官方商船前往南海诸国的行程的文献。这一海上贸易活动，是中国官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确切标志。据载，此次出航启程“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番禺”，汉使终点到了已程不国（今斯里兰卡）。^①从《史记》可知，番禺在西汉时为全国知名的“亦一都会也，珠玑、犀、瑇瑁、果、布之凑”。^②《汉书·地理志》对番禺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市场作用说得更为明确：“处近海，多犀、象、毒冒、珠玑、银、铜、果、布之凑，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，番禺其一都会也。”^③番禺地处天南一隅而兴发，当因其作为对外贸易商品集散地毫无疑义。因此，有学者推断：“关于西汉

① 《汉书》卷二八《地理志》。

② 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。

③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。

远洋对外贸易的出海港和航线,我们认为番禺是出口港,徐闻和合浦是番禺的外港。从而形成番禺—徐闻—合浦—交趾的沿海航线。”^①汉代番禺是对外贸易港口的论断,不仅得自文献上的间接说明,可从地理条件及其在全国商业活动的地位分析,还可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舶来品佐证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黄支国(今印度半岛南部)“自武帝以来皆献见。有译长,属黄门,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、璧琉璃、奇石异物、资黄金杂繒而往”^②。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和合浦汉墓中曾发现玻璃珠,经化验其所含元素的化学成分与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截然不同,而“与西方的古代玻璃相类”^③,应是从海外输入的物品,或即为“璧琉璃”。但是,至今尚未能找到番禺在汉代对外交往的文献记载确证。对于这一问题,不妨转向地方志书求解。

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修志传统,从志书史料中,可以搜索挖掘海上丝路的起端、航线及港口变化、相关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乃至外贸政策及管理、对外经济及文化往来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宝贵资料。广东是海上丝路重要的始发地,广州是历二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外贸港城,在志籍中爬疏耕耘,开卷或有所获。

学术界公认岭南最早的志书是东汉杨孚的《南裔异物志》,这也是已知全国最早的异物志。《南裔异物志》确切成书时间无考,从作者杨孚是在汉章帝建初年间到朝中任议郎推断,《南裔异物志》与完稿于汉章帝建初八年(83)的《汉书》成书时间几乎同时。《南裔异物志》已佚,由于唐宋著名类书《北堂书钞》《初学记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对其内容有所辑录,清人曾钊从中辑佚成卷。该书之辑佚或鲜为海外交通史研究者所留意,向来只是把杨孚的《南裔异物志》当成“一种专门记述边远地区特产的异物志”^④,即当成特产志。也有研究者认为“这是岭南第一部物产志,也是我国第一部区域性物产志;为后人留下了汉代岭南地区植物学、动物学、矿物学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”^⑤,但罕有从与海外交往的角度去看待其中的相关记述。笔者发现,《南裔异物志》辑佚条目中,可寻得汉代岭南与海外交流乃至对海外异国记载的蛛丝马迹,具有极高历史价值。

杨孚是东汉番禺下渡头村(今属广州市海珠区)人,章帝建初年间举贤良对策,入朝任议郎。举贤良对策,全称察举贤良方正与文学,是汉代以才学德行为主要标准的郎选制度的高级形式。汉代指学习儒家经书的士人为“文学”,贤良方正与文学,即德才兼备而又正直不阿的文学之士,由此途径对策入仕者,当然文化素质很高。杨孚入朝议政,反对穷兵黩武,主张“创造用武,守业用文”;反对破坏儒家丧礼,主张“均行三年通丧”之制;

① 陈柏坚、黄启臣:《广州外贸史》,广州出版社,1995年,第44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。

③ 于福熹等:《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》,《硅酸盐学报》1978年第6卷一、二期;杨伯达:《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》,《文物》1976年第5期。

④ 卫家雄:《方志史话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1年,第34页。

⑤ 杨孚:《异物志辑佚校注》,吴永章辑佚校注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11页。

反对苛政贪贿,主张吏治务必廉政。杨孚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物。从其出身及作为,可见他是文明初开的岭南出类拔萃的有识之士。他对岭南地情了解甚详,因而能够写出《南裔异物志》这样覆盖地域广袤、涉及知识渊博的不朽之作。

分析所见《南裔异物志》的记载,可见此书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风土志,而具有面向海洋的特色。

一、《南裔异物志》所载物产不止于岭南地区,还涉及周边地区、海外国

杨孚晚年归居番禺,“其它在河南下渡头村”^①,未见其返乡后出外周游之记载。《南裔异物志》中所记载的物产,如榕树、香蕉、荔枝、甘蔗、桔、杨梅之类,是珠江三角洲本地所常见;但有的条目记述对象如大象、孔雀,未必在番禺能见到,至于獬豸,则是传说中的异兽;还有一些生长于荒山野岭,点明系外郡远地的,如合浦、日南之牛,日南、九真獬豸(长尾猿),郁林大猪,交趾猩猩,九真长鸣鸡,朱崖水蛇,交趾草、交趾稻等。日南、九真、交趾,在今越南之地,合浦地在今广西,朱崖更在海南岛,离番禺并不近,不可能都属杨孚举目可见。有的事物,还是从岭南广阔幅员去记载,如记木棉,“广州、日南、交趾、合浦皆有之”。岭南诸郡,远至千里之遥,在当时交通条件下,到达不易。杨孚载入《南裔异物志》的内容,相当一部分应当是采访所得。所列物产产地,多为沿海之郡,日南、合浦,正是《汉书》所载海上航线的出海港。“合浦港地处北部湾顶部之南流江入海口,向北溯江而上可达北流江,再通浔江、漓江、湘江而达长江水系,或沿西江至云贵,水路交通的便利,使中原地区及西南各地的物资均可通过水路到达合浦”,合浦与徐闻的“这两条水道,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陕西、河南的陆上丝绸之路对接的重要通道,也是岭南地区通过中国南海走向世界的通道”。^②合浦陆海均与其南的交趾等三郡相通,连通南北,被认为是当时两粤通交趾的咽喉。^③《南裔异物志》多处述及合浦、交趾、朱崖等地物产,正反映了汉代番禺与岭南各处沿海港口乃至今之越南、海南等地的往来联系及其交通大港的地位。

二、《南裔异物志》记载了许多海产,包括来自深海和作为贡品之海产

《南裔异物志》所述物产有许多海产,其中有一些产自深海,如鲸鱼、鲛鱼、鹿鱼、鲷鱼、水母。更重要的,有当时岭南及海外作为主要贡品的玳瑁、犀角、象牙等。《史记》《汉

① 屈大均:《广东新语》卷二《地语·河南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43页。

② 张镇洪、邱立诚:《中国南海古人类文化考》,广东经济出版社,2013年,第164页。

③ 陈玉龙:《历代中越交通道里选》,《东南亚史论文集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97页。

书》中点到番禺之所以成为都会的原因,都提及番禺是这些物品之聚。《汉书》班固赞曰:汉武帝时,“睹犀、布、瑇瑁,则建珠崖七郡”。^①《后汉书》记载:天竺国“土出象、犀、玳瑁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。……和帝时,数遣使贡献。后西域反畔乃绝。至桓帝延熹二年、四年,频从日南徼外来献。”^②可见汉代在海南建郡县与其地盛产犀角、玳瑁有关,而汉代岭南的犀角、象牙、玳瑁是海外贡物,也是贪官喜爱掠夺的岭南特产。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记载,汉元帝时,珠崖屡反,汉元帝打算派兵征讨,贾捐之以为“不当击”,他对答奉旨诘问的乐昌侯王商说:“又非独珠崖有珠、犀、玳瑁也,弃之不足惜。”^③推测汉元帝欲征讨的考虑,应包括珠崖出产供应珠、犀、玳瑁的问题,贾捐之的回答,则明确反映了珠玢、犀、玳瑁等物出自多渠道。比《史记》成书约早30年的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已提到,秦始皇“又利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翡翠、珠玢”^④。《南裔异物志》对玳瑁、象牙、犀角均专撰条目记载,以下为辑佚的相关条目。

“瑇瑁,如龟,生南海。大者如蓬蓽,背上有鳞,鳞大如扇,有文章。将作器,则煮其鳞,如柔皮。”^⑤瑇瑁即玳瑁。“蓬蓽”,粗竹席,以喻玳瑁体积之大。《艺文类聚·宝玉部下》引有《南州异物志》“瑇瑁”条,《太平御览·珍宝部八》载有《南方异物志》“玳瑁”条,文字大同小异。《南州异物志》为吴万震所撰,《南方异物志》为唐人房千里所撰,则所记载最早出自杨孚《南裔异物志》,为后世所注意并袭用。

象牙,“俗传象牙岁脱,犹爱惜之,掘地而藏之。人欲取,当作假牙潜往易之。觉,则不藏”^⑥。此条目突出象爱惜其牙的传说。岭南地区古代也有象的活动,直至南汉还有象的活动的记述,东莞今存南汉所建之镇象塔。但岭南之象为亚洲象,其牙与海外进口的非洲象牙不同。广州象岗山“南越王墓出土了许多海外物品,如象牙、乳香、银盒、金花泡等。其中西耳室的五支大象牙,经鉴定是非洲象牙。……这些舶来品,有力地证明了广州早在二千年前即与海外有密切的交往”^⑦。这五支象牙并排堆放,其长度为105—120厘米,体形粗壮,与亚洲象的纤细型象牙不同,应是从海外贩运而来。此外还有刻画象牙、象牙算筹、残牙雕器等3种。^⑧

① 《汉书》卷九六下《西域传》。

② 《后汉书》卷八八,转引自张星烺编注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四册,朱杰勤校订,中华书局,2003年,第1856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六四下《贾捐之传》。

④ 《淮南子》卷一八《人间训》,《百子全书》,岳麓书社1993年版。

⑤ 引自陈彭年《广韵》卷四《代十九》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⑥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八九〇《兽部二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⑦ 广州市文化局编《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》,广州出版社,1999年,第365页。

⑧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广东省博物馆编《西汉南越王墓》(上),文物出版社,1991年,第345页。

“犀，角中特有光耀，白理如线，自本达末则为通天犀。”^①“于惟元犀，处自林麓。食惟荆棘，体兼五肉。或有神异，表异以角。含精吐烈，望若华烛。置之荒野，禽兽莫触。”^②三国吴万震《南州异物志》、晋刘欣期《交州记》、南朝宋沈怀远《南越志》均设有犀的条目，记述犀的形态及犀角的神异。至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中，尚有条目专记岭南之犀：“岭表所产犀牛，大约似牛而猪头，脚似象，蹄有三甲。”^③可知在广州聚散的犀角，有岭南所产，也有来自海外贸易之物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提到：“元始二年春，黄支国献犀牛。”^④同书《王莽传》又提及：“黄支自三万里，贡生犀。”^⑤杨孚的描述，能够为中原人士提供犀及角的信息。

三、《南裔异物志》记载了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情形

《南裔异物志》的记载，不止于物产，还涉及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情景，主要是民俗。如：

当地人“画其面及身，刻其肌而青之，或若锦衣，或若鱼鳞”^⑥的雕题国。

“男无衣服，女横布帷，出与汉人交易、不以昼市，暮夜会，俱以鼻嗅金，则知好恶”^⑦的狼臚国，岭南外贸使用流通货币层次高于内地，《资治通鉴》梁武帝普通四年（523）载：“梁初，唯扬、荆、郢、江、湘、梁、益七州用钱，交、广用金银，余州杂以谷帛交易。”交、广用贵金属交易风盛，以致能嗅出作为通货的金属好恶真假，凭感觉经验鉴别其价值。

国“在海水（按：‘水’疑为‘外’），以草漆齿，用白作黑，一染则历年不复变，一号黑齿”^⑧的西屠国。后来晋左思《吴都赋》也写道：“乌浒、狼臚、夫南、西屠、儋耳、黑齿之首。”

“其衣则缝布二幅，合两头，开中央，以头贯穿，胸身不突穿”^⑨的穿胸人，穿胸之说，有些离奇，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有“贯匈国在其东，其为匈有窍”。贯头其实是服装，《梁书·诸夷传》记载“吴时遣中郎康泰、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，国人犹裸，唯妇人着贯

① 《后汉书·章帝本纪》“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”句下，李贤注。

② 杨孚：《南裔异物志》赞·犀，引自屈大均《广东文选》卷二三《赞铭箴诔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版。

③ 刘恂：《岭表录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④ 《汉书》卷一二《平帝纪第十二》。

⑤ 《汉书》卷九九下《列传第六九下·王莽列传》。

⑥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⑦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。

⑧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。

⑨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。

头”^①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儋耳、珠崖郡，民皆服布如单服，穿中央为贯头。”

“生则镂其颊，……食薯，纺绩为业”^②的儋耳夷。

“群相随行，无常居处，其类与禽兽同。或依大树，以草被其枝上，而庇阴其下。发正黄，如扫帚。见汉人散入草，终不可得近”的“黄头人”；^③

“巢居鼻饮，射翠取毛，割蚌求珠为业”^④的乌浒人。

从这些记述可见杨孚采访记述视野之广。这些族群、方国，位于岭南东、南方，有的在海上，如儋耳、朱崖即位于今之海南省。所记述的镂面刻肤、纺绩、染齿、巢居、贯头穿衣之俗，不仅在古代海南、云南、贵州，也在东南亚等地的土著民族中长期流传。

四、《南裔异物志》记载了许多东南亚海外国家

《南裔异物志》中有扶南国、金邻、斯调国、瓮人的条目，所述国家均为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国家，而瓮人则是海外之人。杨孚对异国的记述，不是道听途说，而有具体记载。与前后一些史籍记载相对照，可为岭南与海外交往之佐征。还要指出的是，在《南裔异物志》中专列条目的扶南、金邻、斯调等国名，在《史记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尚未出现，《南裔异物志》是今见中国最早记载这些东南亚国名的史籍。相关条目如下：

“扶南国，昔但作大扇，遣人持之，不知人各自用也。”^⑤扶南，也作夫南，是汉代、六朝时期中南半岛上的古国名，意为“山地之王”，位于今柬埔寨。有人认为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中记述汉章帝元和元年（84）“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入邑豪献生犀、白雉”中之“究不事”，即今柬埔寨之异译。^⑥若此，则汉章帝时，柬埔寨与东汉官方已有来往。扶南的位置及国土情况，《梁书·诸夷传·海南诸国》有明确记载：“在日南郡之南，海西大湾中，去日南可七千里，在林邑西南二千余里。城去海五百里。有大江广十里，西北流，东入于海。其国轮广三千余里，土地洿下而平博，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。”^⑦扶南与中国一直存在友好往来关系。三国时，扶南在嘉禾元年（232）主动向东吴表示友好，先后三次遣使与东吴通好，孙权则派朱应、康泰回访。《通典》所载其与中国往来，也是从“吴时遣康泰、

① 《梁书》卷五四《诸夷传·海南诸国》。

②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。

③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。

④ 引自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六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⑤ 引自宋·吴淑《事类赋》卷一四《扇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⑥ 白寿彝、高敏、安作璋主编《中国通史》第四卷《中古时代·秦汉时期（上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684页。

⑦ 《梁书》卷五八《列传第四十八·诸夷·扶南》。

朱应使于寻国”^①(时扶南由范寻为王)述起。扶南国王范寻于晋武帝泰始元年(265)、四年(268)以及从太康六年(285)起连续三年每年都遣使入华访问献礼。^②笔者曾考证朱应、康泰出使是由番禺启程。^③朱应、康泰出访活动的重大收获,是将考察见闻撰写成书。回国后,朱应著《扶南异物志》,可惜已经失传,书名见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唐书·艺文志》。康泰著《吴时外国传》,原书虽已佚,部分内容被引用于《水经注》《北堂书钞》《艺文类聚》等许多古籍中。我国最早记载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古籍是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,但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只记载6个古国,而且既没有方位,又无里程,考证起来相当困难。《吴时外国传》除了对扶南重点记述,还记载了31个古国与地区,所载多数国家记有方位与路程。《吴时外国传》比较真实地记载了1700多年前古扶南国的政治、法律、风俗、物产、造船、贸易、交通、对外关系等,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的名著。隋唐以前,柬埔寨本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记载。研究柬埔寨古史,主要靠中国史籍。在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南史》《新唐书》中均设有《扶南传》,这些正史所据的古史材料大多源于《吴时外国传》。柬埔寨古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,得助于《吴时外国传》。研究柬埔寨史的外国学者一般认为,中国史籍中最先提到扶南王国的是康泰的著作,并认为中国史学关于此国古史之记载,多采自康泰、朱应使扶南后之撰述。官方的正式往来之前,当存在一段时间的民间往来,因此,在早于三国吴时的东汉章帝时番禺人杨孚的著述中,出现对扶南的记述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笔者与研究海上丝路史的学者李庆新先生交流对此的看法时,他还认为,这一记述的意义,还在于可能将文献记载的扶南国历史前伸。此条目转引自《事类赋》这一部类书,却并非孤证,在另一部类书《太平御览》中辑佚《南裔异物志》“金邻”国条目,也明确提到“去扶南可二千余里”,这就很可互证。依上所述,迄今见于史籍的关于扶南的最早载述,就应该为《南裔异物志》,而不是康泰、朱应的《扶南异物志》,当然,在记载的详细程度上,《南裔异物志》无法比肩《扶南异物志》,但在首载这一点上却有其珍贵意义。而《扶南异物志》之书名,恰恰反映了朱应的著述承杨孚遗风之轨迹。

“金邻,一名金陈,去扶南可二千余里。地出银,人民多好猎大象。生得乘骑,死则取其牙齿。”^④金邻国地在今泰国西南部,金邻大湾为今暹罗湾。晋左思《吴都赋》有“金邻、象郡之渠”之咏,《梁书·诸夷列传》“扶南国”条有“次当伐金邻国”之载。《新唐书·宦者杨思勰传》有“开元初,安南蛮渠梅叔鸾叛,号黑帝,举三十二州之众,外结林邑、真腊、金邻等国”^⑤的记载。

① 《通典》卷一八八《边防四·扶南》,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三《武帝纪》。

③ 陈泽泓:《东吴朱应、康泰出使南洋事迹考略》,《羊城今古》2000年第4期。

④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⑤ 《新唐书》卷五四《列传·宦者杨思勰传》。

辑佚的斯调国条目不止一条。“斯调国有火州,在南海中。其上有野火,春夏自生,秋冬自死。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,枝皮更活,秋冬火死则皆枯瘁。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,色小青黑;若尘垢污之,便投火中,则更鲜明也。”^①“木有摩厨,生于斯调。厥汁肥润,其泽如膏。馨香馥郁,可以熬膏。彼州之民,仰为嘉肴。”^②“斯调州有木,名摩树,汁如脂。”^③斯调国,学者多认为其地为今斯里兰卡,或说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之东南一岛。所谓火州或为间歇式火山。

汉代广州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,东汉时,从广州西航印度的中国商人或汉代使者,开始在印度、斯里兰卡同埃及、罗马的商人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,而使海上丝路的贸易交流得以接力延长。《后汉书》有延熹九年(166)罗马人遣使直接航行到中国番禺的记载:“至桓帝延熹九年,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牛、玳瑁,始乃一通焉。”^④“桓帝时,扶南之西,天竺、大秦等国,皆由南海重译贡献,而蕃贾自此充斥扬粤矣。”^⑤所载的这些事件,都发生在东汉末年,然而,我们只要注意到,大秦等国所进贡的象牙、犀牛、玳瑁等物,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皆是番禺之所以成为都会的特产,就可以说明,番禺在西汉时已是中外贸易来往的重要聚散地。在这条漫长的远洋航线上,东南亚各国的来往更不是问题。考古发现,加里曼丹出土的印图圈纹陶甗,与广州出土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同类器皿外形非常相似。苏门答腊发现的陶器中有一个灰陶三脚鼎,底部刻记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(前45)年号。而广州汉墓常见的燃薰炉所用的各种香料,绝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各国。这说明这些国家是经常往来贸易、交换物品的。至东汉“永建六年(131)日南徼外,叶调王便遣使贡献”^⑥。叶调国在爪哇岛上,其国王以其土特产玳瑁、象牙、犀角、香料向汉朝贡献,实质上是一种官方的贸易。在加里曼丹的沙捞越河口还发现有西汉元鼎五年(前112)的五铢钱,证明西汉与东南亚国家已有贸易关系。^⑦“广州汉墓的出土文物中,常见熏炉。这说明当时广州的富豪之家普遍燃烧香料。这些香料的大部分也是从东南亚地区输入的。在广州的汉墓中,还有较多的串珠出土,包括玛瑙、鸡血石、石榴石、煤精、水晶、硬玉、琥珀和玻璃等。还有迭嵌眼圈式玻璃珠、蓝色玻璃碗、绿色玻璃带钩和璧。其中带钩和璧是我国传统的礼仪用品,其他则与传统工艺品不同,应是从海外输入。”^⑧

① 引自裴注《三国志》卷四《魏书·三少帝纪》。

②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六〇《木部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③ 引自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六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④ 《后汉书》卷八六《南蛮·西南史传》。

⑤ 《后汉书》卷八八《西域传·大秦》。

⑥ 《后汉书》卷八六《南蛮·西南史传》。

⑦ 陈柏坚、黄启臣:《广州外贸史(上)》,广州出版社,1995年,第52页。

⑧ 杨万秀:《广州外贸的历史地位和特点——〈广州外贸史〉序》;杨乃秀主编,邓端本、章深:《广州外贸史(上)》,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6年,第2页。

瓮人,“齿及目甚鲜白,面体异黑若漆,皆光泽。为奴婢,强勤力”^①,应是当时输入中国的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的马来人。“在广州汉墓出土文物中,还有一种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,这些俑深目高鼻,两颧高,宽鼻厚唇,形象有异于汉人,亦不同于一般的侍俑。考古工作者认为他们就是杨孚《异物志》中的瓮人。”“这些‘瓮人’就是通常所说的‘黑奴’,他们‘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,也有可能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’。既然他们被杨孚载入书中,则当时广州富人使用这种奴隶已不是个别现象,而且其进口也有相当的一段时间。”^②“这些‘奴隶’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,也在可能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。他们被除数贩运到中国后,成了当时贵阳市家豪族的家内‘奴隶’。”^③

总而言之,《南裔异物志》中的上述记载,可以作为东汉时岭南与东南亚一带海外来往的实证史料。

《简明广东史》评价杨孚的《南裔异物志》“是南海郡人第一部学术著作”^④。这部学术著作,显示出岭南著作的地方特色及其在学术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。“现知的异物志,以东汉杨孚《南裔异物志》为最早。”^⑤基于以上所述,从《南裔异物志》中,可以检索到汉代岭南与海外交往的一些线索。特别要指出的是,有学者注意到,异物志这种体裁的编纂,其实“与朝廷索贡有关,也与增广中原人士见闻有关”^⑥。嵇含在《南方草木状》序中说到:“南越交趾植物,有四裔最奇,周秦以前无称焉。自汉武帝开拓封疆,搜求珍异,取尤者充贡,中州之人或昧其状,乃拟所闻论叙,有裨子弟云尔。”王庸指出:“东汉以降,有所谓异物志者,其意义与《山海经》之记异物相类似而较为核实。且其所述,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,所以为北方人广见闻者。”^⑦由此可见,称异物志为物产志还不全面,异物志应属风物志大体还可以,而最准确的还是异物志原称,其猎奇炫异的作用在于反映乡土可爱,增广见闻。《简明广东史》称其“在内容上向后人提供了汉代岭南植物学、动物学和矿物学的第一手资料;它也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异物志,在体例上开了这类著作的先河”^⑧。还是恰切的。《南裔异物志》成书时间,近乎《汉书》,《汉书·地理志》被公认为最早关于海上丝路南方海外航线官方行为的纪录,是我国最早记载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

① 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〇《四夷部一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② 杨万秀主编,邓端本、章深:《广州外贸史(上)》,第17页。

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考古研究所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博物馆编《广州汉墓》,文物出版社,1981年,第478页。

④ 蒋祖缘、方志钦主编《简明广东史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3年,第99页。

⑤ 王晓岩:《方志演变概论》,辽沈书社,1992年,第38页。

⑥ 王晓岩:《方志演变概论》,第38页。

⑦ 王庸:《中国地理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38年,第133页。

⑧ 蒋祖缘、方志钦主编《简明广东史》,第99、100页。

的古籍,那么,《南裔异物志》就应该是岭南最早有海上丝路相关记述的志书,是全国最早记载海外风物的志书,也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述扶南等海外国家的古籍。

作者简介:

陈泽泓,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研究员。

若干烹调用香料作物的起源、发展与传播^①

张 箭

[提要]胡椒、肉桂、丁香、生姜均是著名的烹调用香料,又是常用的中药。生姜还是蔬菜。它们在东方饮食文化和烹饪技术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烹调用香料和其他香料、黄金、珠宝、土特产构成丰饶的东方财富,经马可·波罗渲染激起西欧人的渴望,吸引他们远航而来,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巨变。郑和下西洋时,中国也从南洋、西洋采买香料。本文论述这四种香料的起源、发展、传播、栽培的历史,并旁及它们的作用和意义。

[关键词]胡椒;肉桂;丁香;生姜;烹调用香料;发展历史

香料指在常温下能发出芬香,具有挥发性并能用以配置香精的芬芳有机物质。分为天然香料和人造香料两大类。^②天然香料按其原料又分动物香料和植物香料两类。动物香料包括麝香、灵猫香、龙涎香、海狸香等。窃以为,植物(或作物)香料按其作用又分两类:一是用作芬芳、美化、装饰作用的,如取之玫瑰、蔷薇、香圆(椴)等的香精油、沉香、檀香等;二是用作吃食的。在吃食植物香料中,我认为又可分两部分:一部分供人们闻香,如香草/香子兰、薄荷、香茅、香青兰等,用于糖果糕点饮料的提香;另一部分用作烹调用料,如丁香、胡椒、茴香、小茴香、苜蓿、香菜/胡荽/芫荽、生姜、肉桂等。15—16世纪,

^①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15—19世纪的全球农业文明大交流”(批准号13AZD044)、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(批准号SKZD201407, SKQY201215)资助。

^② 参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香料”词条,商务印书馆,1997年,第1373页;《辞海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1999年,第2444页。